

# 年鉴社会记忆功能中的仪式与话语

刘书峰\*

**摘要** 年鉴逐年连续出版,其成果以资料性和工具性为突出特点,其行动持续时间长、参与者众多,有一定社会影响。无论从成果还是行动看,年鉴在形成社会记忆、集体记忆方面担负着重大责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年鉴事业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具有仪式性质、发挥着情感认识、信念培养、文化认同、社会整合等社会记忆功能;与此同时,我国年鉴形成了权威的、稳定的、正面的、成就式的、发展的、和谐的话语特色,并正在以依法治志的方式固定下来。从“仪式”和“话语”的角度,年鉴塑造了社会记忆并形成了集体记忆,新时期年鉴在建构集体记忆、塑造身份认同等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功能方面有所拓展。

**关键词** 年鉴 功能 集体记忆 仪式 话语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的年鉴事业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一方面,发挥着情感认识、信念培养、文化认同、社会整合等社会记忆功能;另一方面,所出版的年鉴形成了权威的、稳定的、正面的、成就式的、发展的、和谐的话语特色,并以“依法治志”的方式固定下来。因此,无论从年鉴成果还是编纂活动看,年鉴在形成社会记忆、集体记忆方面担负着重大责任。本研究尝试从“仪式”和“话语”的角度,关注年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功能,对新时期年鉴在建构集体记忆、塑造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功能进行初步探讨。

## 一、年鉴与集体记忆

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于 20 世纪 20 年代出版的《论集体记忆》,成为人们研究集体与社会对记忆进行制约与塑造的经典著作。他“首次提出‘集体记忆概念’,将个体的记忆置于集体的框架之中。个体不仅在社会环境中获得记忆,而且有赖群体的框架来唤回和重构记忆。哈布瓦赫认为记忆并非对过去的保留,而是在现在

---

\* 刘书峰,男,山东省济南市人,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辑部副主任、副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年鉴方志研究、新闻传播研究。

基础上的重新建构”<sup>①</sup>。随着哈布瓦赫理论的流行,人们开始普遍认为,个体记忆只有放在集体记忆中才能真正成为记忆,或者说个人的记忆是依赖于集体和社会的。近年来,对集体记忆的研究成为我国档案学、人类学等研究的热点之一,其出发点是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的转化过程等。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世界记忆”工程,旨在促进人类珍贵历史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和利用。1995年,国家档案局成立“中国世界记忆工程国家委员会”,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当前,以各地档案机构为主体开展的“城市记忆工程”等也形成了较大声势。截至2016年底,已有103个地市级以上城市或城区开始这一工程。<sup>②</sup>年鉴工作每年一度的活动过程以及年鉴成果所具备的年度性、工具性、资料性,在建构社会记忆方面形成“仪式”、建构“话语”,具备特殊的活力。

年鉴编纂活动的特点在于其每年一度的过程性。每年一度的征集资料、修订大纲、培训提高、出版发行等行为,这种看似例行公事的过程其实是一种“仪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与年鉴工作相关的资料搜集者、提供者、编纂者等。当前,我国每年出版的年鉴有几千种,每年参与年鉴编纂活动的人数以万计,涵盖中央、省、市、县等各级以及各行各业。因此从宏观的角度看,每年各地各行业的年鉴编纂活动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思想动员。

年鉴具备资料性、年度性和工具性等属性。年鉴的资料性是塑造共同历史记忆的基础。每年一度内容方面的更新是年鉴所特有的“活力”。年鉴的工具性,赋予所刊载知识一定“权力”,保证其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年鉴“话语”的选择和确立,正是社会记忆不断被集体创造、修正、记录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年鉴事业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一方面,具有一定的“仪式”性质,发挥着情感认识、信念培养、文化认同、社会整合等多种社会记忆功能;另一方面,我国年鉴在结构方式、文体特征、语言使用等方面也具有独特的话语特色,并以依法治志的方式将年鉴话语固定下来。本研究尝试从“仪式”和“话语”的角度,探讨年鉴活动和年鉴成果如何塑造社会记忆、形成怎样的集体记忆,从而对新时期年鉴的社会功能进行再认识。

## 二、仪式:年鉴编纂活动的意义

### (一)仪式与记忆

“仪式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现象。是在一定的情境(如宗教,或者世俗庆典等)中被反复使用且被赋予特殊的象征意义的活动的总称。狭义上,仪式也单单指宗教仪式;广义上则指人类文化中任何模式化(Patterned)的象征性活动,例如选举、节庆等。”<sup>③</sup>范·根纳

<sup>①</sup> 钱力成、张翻翻:《社会记忆研究:西方脉络、中国图景与方法实践》,《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6期。

<sup>②</sup> 徐拥军:《档案记忆观与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传承》,《中国档案报》2017年8月10日第3版。

<sup>③</sup> 胡易容、赵毅衡编著:《符号学—传媒学词典》,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9页。

普(Arnold Van Gennep)在其代表作《通过仪式》中认为,人的生命中总是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进行转化,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需要一个仪式,比如毕业、婚姻、升职等,这被称为“通过仪式”。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则在其代表作《象征之林》中扩展了仪式的范畴,他认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还存在一种“强化仪式”,这种“强化仪式”的目标是为了让人类铭记某个过去的时间或事件。比如纪念某一场战争、纪念国家的成立等,这种仪式相比之下更具有群体性。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在《社会如何记忆》中也以较大篇幅论述了仪式对社会记忆的功能,如仪式的程式化、重复性都极大地帮助了形成社会记忆,而且仪式往往具有一定的“原型”。如果将年鉴编纂过程看作一个仪式的话,其原型可以看作两个过程的集合,一是下级向上级报送年度总结,二是上级对该年度总结的认可和发布。征集资料、修订大纲、培训提高、出版发行等程式化行为,每年重复一次,这种看似例行公事的过程作为一种“仪式”,强化了下级组织与上级组织的关系这一原型,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与年鉴工作相关的资料搜集者、提供者、编纂者等。另外,由于这一仪式的结果即年鉴向全社会发布,使这一仪式的影响范围得以扩大至全社会。

社会的个体成员通过参与或观看仪式,产生强大的激情,并且建立起认同感。仪式虽然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举行,但是“在仪式上展示的一切,也渗透在非仪式性行为和心中。……仪式能够把价值和意义赋予那些操演者的全部生活”<sup>①</sup>。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我国每年出版的年鉴有三千多种,每年参与年鉴编纂活动的人数以万计,涵盖中央、省、市、县等各级以及各行各业。因此从宏观的角度看,每年各地各行业的年鉴编纂活动是一场全国范围、各行各业、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思想动员。

## (二) 年鉴活动的“仪式”功能

在社会学、人类学等对仪式的经典定义中,仪式被认为是象征性的、表演性的、具有一定文化规约作用的一整套活动。而年鉴这一广泛意义上的“仪式”,是以特定地域和专业内容为基础的,包含组织培训、形成大纲、征集资料、多次编校、出版印制、发行销售等一整套具有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的每年一度的活动。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仪式在人类社会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发挥情感认识、信念培养、文化认同、社会整合等多种社会记忆功能。

情感认识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设立了“九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4 国家宪法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等,这体现了国家对仪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起作用的重视。年鉴“仪式”中,通过重点记载每年一次的系列程式化活动,增加人们对该年鉴所涉及地区、行业的熟悉程度,重现年鉴所刊载内容的历史情境,增进参与者亲身的情感和直接的认识。

信念培养功能。古代封建王朝进行国家祭祀的庄严和儒家对礼制表演的强调,是从国家层面强调其统治的有效性以及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将儒家的“礼”作为一种价值观传递给每个百姓。在现代社会年鉴的“仪式”中,大多存在资料审核、领导签字、单位盖章等系列环节,这些环节强化了年鉴工作的仪式感,仪式成为培养信念的重要契机和载

<sup>①</sup> [美]保罗·康纳顿著,那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0页。

体,使参与者和旁观者对年鉴这一“仪式”更加信服。

文化认同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政治仪式的功能作用,在重大政治生活和重大庆典期间举行相应的政治仪式,既展示党和政府的立场、展示国家建设成就,同时强化人民对意识形态、对政权制度、对政治权威的认同。在年鉴的“仪式”中,参与者既有专业从事年鉴工作的人员,也有业余的资料提供人员。他们因年鉴工作而聚合在一起,对年鉴所涉及的专业、地区形成不同层次的文化认同。

社会整合功能。“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sup>①</sup>年鉴“仪式”中,总有不同的新鲜血液补充进来,有关教育培训贯穿年鉴工作活动的始终,对目标行为实施正强化,对非目标行为实施逆向强化以及对正确行为实施重复性强化,年鉴编纂成为一种社会整合和思想动员活动。

从“仪式”的观点看,年鉴的编纂行为实现了情感认识功能、信念培养功能、文化认同功能、社会整合功能,这正是社会记忆不断被集体创造、修正、记录、强化的过程。

### 三、话语:资料性工具书的叙述策略

#### (一) 话语与记忆

话语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下的具体的语言交际事件或这一类现象”<sup>②</sup>。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将语言文本本身与语境结合起来分析,既包括文本方面的篇章、结构、文体、语言、修辞,也包括语境方面的社会、权力、传播、心理等。“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外在的表达形式。……不同特色、不同风格、不同气魄的话语表达,对于某种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增强传播力、竞争力、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的效果是不一样的。”<sup>③</sup>年鉴作为年度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应当被看作一种文字、文化、历史等多元因素交融的文化话语。年鉴自身的话语策略和形成的话语体系,最终形成特定的社会集体记忆。

年鉴话语将社会的现实社会秩序凝结在篇目中,通过不断地重复,使读者牢牢记住这一秩序。这在地方综合年鉴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篇目、内容有较为严谨的设置,且大多较为稳定。如有当年需要特别升格处理的,也往往经反复论证后才审慎推出。年鉴内容结构的稳定性,形成年鉴权威、稳定的话语系统。年鉴年复一年连续出版,在重复中内化成稳固的社会记忆。

年鉴话语对当年所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解释,通过官方的权威认证,使人们形成对该事件的情感与态度。如许多地方年鉴中刊登“案例举要”,将当年当地破获的较为重大、知名的案件进行简述,起到警示作用。这类年鉴“话语”往往以完成的事实进行引导,多为正

①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8页。

② 施旭:《构建中华话语研究体系》,《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页。

③ 张国祚:《关于打造话语体系的几点思考》,《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3年第4期。

面的、成就式的。

年鉴话语对当年社会中所弘扬的、所反对的进行记录,通过一系列记载,帮助人们树立特定的价值观。如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各地方年鉴中也忠实记载和反映了当地反腐倡廉的行动、成果。通过年鉴的记录,促进全社会形成对反腐倡廉在振兴国家、实现中国梦重要作用的基本共识。这类年鉴“话语”多为发展的、和谐的。

总体看,年鉴话语是一种建构性话语,对读者的情感、态度、认知、价值观等记忆方面的影响主要是权威的、稳定的,正面的、成就式的,发展的、和谐的。

## (二) 以法律的形式固定年鉴话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年鉴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年鉴事业格局。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这是我国方志、年鉴工作史上的里程碑,地方志、年鉴工作进入有法可依的阶段。这一工作条例明确了地方志、年鉴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对于规范、促进我国地方志、年鉴工作具有重要意义。2012年7月13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四届三次会议通过《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试行)》。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标志着地方志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从依法修志向依法治志的现代转型”<sup>①</sup>。2016年12月22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2017年12月21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修改制定《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对框架、资料、内容、出版等各方面做出规定。这一系列条例、规划、规定,为推进全国年鉴事业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注重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联,他认为“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sup>②</sup>。在有关话语和权力的讨论中,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由谁来实施权力”,而是“权力是如何运作的”。但显然,在新媒体环境下、各种新媒体层出不穷的时代,通过法律形式来确定年鉴事业的性质、原则、任务,地方志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责,年鉴事业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有关机构与人员职责以及违法责任等,规范各类年鉴编纂行为,才能真正保障年鉴编纂活动沿着正确方向健康有序发展。也正是在依法治志、依法治鉴的框架下,年鉴话语一步步强化,以正面的、发展的、和谐的、成就式的话语,潜移默化地塑造人们的集体记忆。

## 四、结语:新时代年鉴功能的拓展

### (一) 意义:年鉴功能的拓展

国内年鉴界对年鉴功能的探讨由来已久,对年鉴功能的观点也一直各持己见,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当前有关年鉴功能的代表性看法可归纳为以下三种:第一种观点认

<sup>①</sup> 冀祥德:《论依法治志》,《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5期。

<sup>②</sup> [法]米歇尔·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1页。

为年鉴与地方志一样,主要功能是“资治、存史、教化”;第二种观点认为年鉴的主要功能是为现时服务;第三种观点则主张年鉴具有多种功能。无论以上哪种观点,均是以年鉴文本编纂成书出版后所产生的作用为关注对象,所以应尝试跳出年鉴到底是为现实服务还是重在存史的分析框架,将眼光拓展至年鉴编纂的全过程,挖掘年鉴的文化和社会功能,从“仪式”与“话语”的角度,动态关注年鉴编纂活动本身所产生的社会记忆功能和效果。

“集体记忆是族群认同的基本依据,是共同体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拥有集体记忆未必能构建和维系一个族群,而集体记忆的消失则注定造成共同体的孱弱、分裂和覆灭。”<sup>①</sup>在互联网时代,社会发展被新技术深度改写,人类文明正在由新的载体试图重新记录。面对集体记忆被重写、解构的可能,年鉴这一载体在新媒体时代仍有重要意义。深刻认识年鉴在建构集体记忆、塑造身份认同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成为年鉴、地方志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重要而紧迫的社会和文化议题,也是年鉴编纂工作能否真正更上一层楼、年鉴能否真正发挥社会作用的重要认识前提。

## (二) 途径:转变认识,付诸行动

一般认为,年鉴编纂人员是记录者,并不参与到社会生产中来。实际上,年鉴工作者应转变认识,应积极融入社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编纂年鉴不仅要为年鉴文本负责、对记录历史负责,更要对现实负责、对影响社会负责。这对年鉴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通过对年鉴负责人的培训,规范年鉴工作流程,强化年鉴资料收集,通过多种手段调动一线供稿人员的积极性,从而达到提高年鉴质量、发挥年鉴社会作用、建构社会记忆的目的。

除了重视编纂成果,也要重视年鉴编纂过程。为了达到影响社会的目标,年鉴工作应更广泛、深刻地进行社会动员。改变现有以文本为主的模式,更多地走向社会、走向田野。年鉴工作应更多地通过实地考察、小组访谈、口述史等方式搜集史料,更加重视与“人”的互动,与一线基层生产和工作互动。这样的工作方式,一方面获取更为可靠的一手材料,另一方面也在潜移默化的工作中影响人、塑造人。为整合社会、协同发展做出贡献。

通过比照2006年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和2015年颁布《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可以发现,我国年鉴在十年间有了极大发展,年鉴的定位已经从“工作”变为“事业”,这是年鉴应重视编纂过程、发挥现实社会作用的基础。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年鉴在新时期的发展建设需要将集体记忆、身份认同的思维纳入年鉴发展创新的框架下,为年鉴发展拓宽新视野,为社会治理提供新思路,建设更加有整体活力的年鉴事业。

责任编辑:范锐超

<sup>①</sup> 胡百精:《互联网与集体记忆构建》,《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